

當代美中衝突之溯源—探索性的 結構性分析*

林子立** 沈有忠***

壹、前言

貳、新古典現實主義與美中衝突

參、美中戰略的衝突

肆、美中的經濟衝突

伍、美中的意識形態衝突

陸、結論

本文以新古典現實主義，從「空間」、「認識理念」、「時間」等三個層次，以及「戰略」、「經濟」和「意識形態」三個面向，結構性的檢視了美中在川普任期四年中各項衝突發生的原因與意涵。以空間而言，雙方政治制度分歧以及對國際秩序要求的分歧，使得雙方衝突難免。綜合空間與認識理念，展現在時間

* 本論文初稿曾發表在 2019 年國際關係年會「現實主義、民粹主義與科技發展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主持人、評論人林若零名譽教授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亦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及編輯委員會之寶貴意見，然文中若有不足之處由作者自負文責。

** 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E-mail: maxtl@thu.edu.tw

*** 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E-mail: yuchung@thu.edu.tw

投稿日期：2020 年 8 月 13 日；接受刊登日期：2021 年 7 月 6 日。

東吳政治學報/2020/第三十八卷第三期/頁 121-174。

層次上，進入美中的各面向的衝突。關鍵的因素不在於何時崛起，而是在於何時感受到威脅。以時間而言，崛起的中國已經是一個不可逆的事實。隨著時間的進展，中國各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持續成長，都將縮小與美國的差距。亦即，中國在文化、世界觀、政權運作等許多意識形態的本質上，不僅與美國傳統的民主自由並不相容，也對美國利益產生威脅。本文驗證因為美中兩國的三個層次與三個面向分歧，成為結構性衝突。因此，美中之間的競爭與對抗不會隨著拜登當選總統或是 Covid -19 疫情結束而落幕，而是會持續性的競爭直到國際體系建立新秩序。

關鍵詞：美中衝突、美中貿易戰、新古典現實主義、國際秩序

壹、前言

回顧美國總統尼克森（Nixon）應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前往北京訪問，尋求聯中制蘇，時隔 47 年的時間，華盛頓反過頭來需要制衡實力逼近美國的中國，不禁讓人感嘆時間是國際關係永恆的變數，隨著時間的變化，國家力量的消長，大國關係隨之改變。美中衝突的白熱化，雖然始自於上一任總統川普（Trump）發動貿易戰，但是歷史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起始，兩國之交鋒就不斷的上演，特性上是易於受到國際體系與秩序變動的影響，因此美中的關係也呈動態發展。要能夠理解美中衝突的本質，有賴國際關係的理論架構，能夠將繁複的關係釐清。近幾年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不斷的努力，企圖將自身從外交政策理論，擴大為國際政治理論，「國際政治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就展現了這樣的企圖心（Ripsman et al., 2016）。運用到本文闡述美中衝突的分析，提出三個層次（空間、認識理念與時間）與三個面向（戰略、經濟、與意識形態）的分析架構。空間層次上，指的是美中兩國的政治結構的分歧，乃至於對於國際秩序要求的分歧；亦即是，空間包含國內到國際在權力上競逐。認識理念層次上，指的是在全球化生產結構改變造成國家經濟力量的此消彼長，從而擴大雙方意識形態的分歧；簡言之，認識理念主張決策者以國家間理念不同，作為彼此對抗的重要支撐點。最後，時間層次上，指的是國家力量的變化改變彼此的關係，從過去夥伴變成今日的大國競爭；換句話說，時間強調今非昔比，相對力量並非靜止不動。

理論的目的是將中美的既衝突又合作的關係立體化，但必須搭配歷史的縱深，才能進一步從脈絡中得出更宏觀的視野。美國幫助國民黨政府贏得了對日戰爭，卻無意願過度介入中國內戰。另一方面，共產政權的建立是得利於中國國民黨在二戰之後的治理失敗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後簡稱蘇聯）的協助，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於北京正式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際適逢冷戰開始之初，作為蘇聯扶植的政權自然站在與美國的對立面。此一情況因 1950 年 6 月韓戰的發生而加深美中對立，美國基於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從而突顯出台灣戰略地位，美國開始將大量的經濟與軍事援助，提供給蔣介石所領導的「自由中國」在台澎金馬（林孝庭，2017）。換句話說，二戰後世界秩序迅速成為對立的雙極體系，不僅一方面造成韓戰的發生，也有助於中華民國在台灣建立。基於各自不同的理由，美中雙方都將中華民國在台灣視為自己國家利益的延伸，雖然不妨礙日後雙方的建交，但美中轉變成為競爭關係時，台灣的戰略樞紐地位立刻突顯出來。

古巴飛彈危機使得美國徹底認清蘇聯的意圖與戰略，尼克森就任總統後，基於戰略三角的思維（Lowell, 1981），認為美國處於三角中獨自的一方非常不利，正好中蘇兩國因毛澤東與赫魯雪夫（Khrushchev）的關係惡化，兩國在邊境不斷迸發衝突。1969 年 3 月的珍寶島事件讓尼克森看到了機會，指派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季辛吉（Kissinger）秘密訪華，（Kissinger, 2011）為美中關係正常化打開第一扇窗。

歷經長達 10 年的發展互信關係，直到鄧小平全面掌權成為關鍵點，1978 年 12 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鄧的領導地位，他所採取的「改革開放」政策，說服美國總統卡特（Carter）相信，在美

中建交之下，中國會逐漸融入美國所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Lampton, 2018）。從那時候起，美國建立了一個錯誤的假設，誤以為美國能夠將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和外交政策帶來根本性的改變（Campbell & Sullivan, 2019）。中國崛起雖然帶來挑戰，但美國不僅經濟能從中獲益，其產生的威脅是可以控制，美國有足夠時間進行戰略調整（Medeiros, 2019）。

柏林圍牆倒塌與冷戰結束造成國際體系從雙極走向單極體系的結構，Fukuyama 在此之時寫下他的成名之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ukuyama, 1992），宣稱自由民主是最適合人類的政治制度，能夠最好地滿足人類的所有需求。但是，在政治與戰略上達到巔峰的美國，經濟上卻已經開始產生了結構的變化。美國的基尼係數很快的惡化到 0.4 以上，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全球化下使較為低階製造業外移或外包，導致大量的勞工失業，而資本家仍能在全球的範圍內賺取利潤（Contractor, 2021）。美國部分製造業因為生產成本的因素逐漸遷到亞洲，但是許多高科技產業掌握技術、專利與資金，使得勞工與菁英階層的差距日益擴大。

上層與下層發生嚴重的貧富差距，在柯林頓（Clinton）總統任內擔任美國勞工部長的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教授 Reich 的《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Reich, 2015）一書中有詳實的描述。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威脅不再是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而是對現代社會對增長和穩定所需的信任不斷的被破壞。1999 年諾貝爾獎得主 Stiglitz 更在 2011 年提出美國是 1% 所有 1% 所治 1% 所享（Stiglitz, 2011）。探究其因，「雷根主義」（Reagan Doctrine）開始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加上全球化的貿易鼓勵製造業

外移，從而造成大量勞工階層收入不穩定的同時，反而讓華爾街看到機會，從 2003 年開始將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證券化，鼓勵收入不穩者買房，這在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Greenspan, 2010）的眼中，就成有毒資產。2008 年爆發的次級房貸風暴其來有自，貪婪的華爾街金童利用金融保險的槓桿力量套利，經濟景氣時尚可遮掩，一旦景氣循環至往下的階段，這種摧枯拉朽的金融破壞力量，便使得美國經濟能力元氣大傷。翌年又連帶的爆發歐債危機，很快形成了全球金融危機，標誌著西方國家經濟力量相對下滑的一個重要標誌。

美國到底是盛還是衰，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國崛起則是幾乎一樣的事實認定，其速度與廣度，搭配著 2001 年入世標誌著全面融入全球生產秩序，北京早已揮別天安門事件的陰霾，說服世界中國是和平的崛起（鄭必堅，2004），不過後來改用「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無論是哪一種說法，胡錦濤時代的中國戰略特徵即是為了回應美國開始的「中國威脅論」擔憂，認為中國在尚未真正崛起之前，必須在符合中國利益與價值的前提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蕭全政，2004）。然而，到了習近平主政的 2012 年開始，他很快的也有了自己的戰略，同年 11 月 29 日提出「中國夢」，及後續「強軍夢」（杜玲玉，2015）。在 2013 年在非常相近的時間內，相繼推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後稱 AIIB），此一企圖建立中國式的區域秩序逐漸引起美方重視，正如學者蕭全政（2020）觀察到一帶一路已涵蓋亞歐非三個大陸：「從亞洲命運共同體到歐亞命運共同體，再到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名，而與海權霸主的美國爭勝，很明顯的已經上路。」再者，2017 年 5 月北京舉辦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吸引二十

九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領袖，以及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和七十多個國際組織的一千五百多名外代表參加。（傅豐誠，2017）也就在此之際，Allison 出版了《命中註定的戰爭：美國和中國能逃過「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Allison, 2017），也促使川普政府重新思考對帶路倡議的戰略意義（蕭全政，2020）。同時，像是印度、澳洲、日本、加拿大以及歐盟諸國也開始接受川普政府的對中圍堵政策。不僅如此，華府也致力於運用中東及非洲地區上結合美國力量，提供應對中共佈局已久的戰略籌碼和地理縱深（謝志淵，2018）。

在前述美中發展的基本輪廓下，本文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全球化的推動者美國與全球化最大贏家中國會產生全面性的衝突？美國的國民總收入逐年上漲，並沒有下滑的現象，為何要走上保護主義的道路？答案可由 2020 年 5 月 20 日白宮公布《美國對華戰略報告》（*U.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ort*）（The White House, 2013）來觀察，該報告具體指出中共對美國的經濟、價值和安全都構成挑戰，並且自承美國對過去的對華政策結果失望。事實上，中國威脅論並不是始於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但是強烈回應中國的崛起卻是川普，是否肇因於習近平的帶路倡議戰略改變胡錦濤的和平崛起所造成的？

儘管北京一再宣稱根本不需要擔憂中國的霸權崛起，如同習近平訪美時所說的，太平洋夠大，容得下兩個大國（歐錫富、龔祥生，2019）。但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焦慮與不滿早在 1990 年代就開始，哈佛大學學者編了一本經略中國的書，研究美國應如何管理崛起大國（Johnston & Ross, 1999）。該書所展露的，正是美國認知到中國是未來的威脅，說明何以胡錦濤時期一再以「和平崛起論」化解「中

國威脅論」，甚至經由華盛頓來壓制臺北（林正義，2009）。為求精準的解構美中兩國利益衝突，本文將藉由新古典現實主義，將前述的空間、認識理念與時間三個層面，並引用 Kennedy（1989）在其《世界強權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所使用「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構出三個面向，因為他也主張經濟決定國力，而國力決定國際關係，非常適合解析美中兩國衝突的本質與核心。雖然美中戰略衝突仍以「軍事」為最高位階，包括 GPS 衛星、北斗 3 號，及太空軍等，不過由於川普任期內美中未曾發生過軍事實質衝突，因此本文行文上以「戰略」取代「軍事」闡述美中潛在衝突。

貳、新古典現實主義與美中衝突

要解釋美中貿易衝突，如果只看到美國的貿易赤字或是政黨競爭的因素，而忽略了美國已經無力維護的國際政治與貿易秩序，就容易得到錯誤的答案。相同的，只強調現行的不均衡多極體系因素，美國已經無力主導國際經貿秩序，那麼對中國發動關稅戰不僅無法改善美國的貿易赤字，還會導致美國物價上漲，貿易戰的思維也會有侷限性。相較於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合作與建構主義重視的規範，現實主義則主張國家為了生存，衝突是難以避免的，因此採用現實主義的途徑解釋美中全面衝突是相對理想的。在諸多現實主義的學派中，新古典現實主義有其優越性。其之所以「新」，是接受 Waltz（1979）所提出的重要核心概念，即是「國家行為是由國際體系的壓力來決定，而非國家內部政治的決定」。而 Waltz 為了建構國際關係理論並顧及簡約性與解釋性的必要，特意的撇除國內因素，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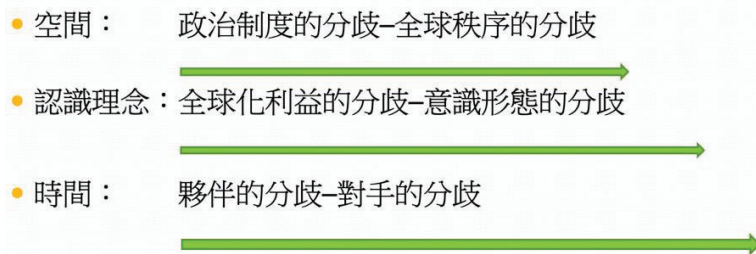
不能作為外交政策理論。再者，新古典現實主義之所以是「古典」，是因為也重視並強調國內因素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下生產秩序被改變後，民主國家普遍遭受貧富差距所產生的政治壓力，國內因素比過去更有能力影響國家的對外戰略，在解釋兩國衝突中，無法簡單的加以省略。特別是，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與百年前的貧富差距嚴重性是相當的（Piketty, 2014），龐大的經濟弱勢族群導致民粹政客得以運用煽動性的語言攻擊建制派，國內的經濟困境又因全球化的國際因素，並不是個別國家可以單獨解決自身內部經濟問題，然而選民一定將經濟困境問責於政府，此種國際與國內因素將國家決策者的政策空間壓縮得非常有限。

當內部經濟問題難以用內部治理解決時，在尋求他國合作無效時，將責任外銷就成為決策者常用策略，突顯出中美衝突是雙方國家權力的消長，因此，Morgenthau（1963）所強調的由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在當前的大國競爭時，更顯得的重要。結合新與古典，目的並不是要各取其優避其缺，而是理論的發展有其時代背景，而隨著時間的演變，國際環境與國內政治提供的限制與條件不斷在變化，國家決策者必須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否則無法維繫有效治理國家。換句話說，理論雖有其歷久彌新的必要性，但也必須結合實務的發展而進行調整。本質上，現實主義是核心，新與古典是依賴變數與獨立變數的相互影響。

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框架下，探究新型態的大國外交，必須同時兼顧國家內部權力關係以及國際間的權力結構。Rose（1998）以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外交決策時指出，國家之間的外交決策，係基於相對的物質權力，如同 Thucydides 的詮釋：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此外，一個國家的外交決策，亦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

也就是國內社會團體的壓力與互動，影響了決策者的外交政策。美國對中國採用衝突策略，事實上是基於強者壓制後來居上者挑戰的理性，即是「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 Trap）。以三個面向分析，在戰略上對美國而言，現在對中國發生衝突的成本遠低於未來，而對中國來說，與美國發生衝突的時間不是由挑戰者（北京）決定的，而是由領先者（華府）發動的；在經濟上，對中衝突符合國內政治團體、社會輿論的主流意見，並且以「硬中帶軟」、「軟硬兼施」的方式為策略。在意識形態上，民主與威權體制衝突與前後物質衝突是一體兩面，相互補充了衝突的正當性。

如果將這些原則加以圖像化，三個層次是一個過程，逐漸與三個面向（戰略、經濟、意識形態）形成三個構面的美中衝突三角形的發生。圖示如下：



圖一 美國與中國三個層次分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在圖一的概念強調的是過程，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途徑，而以空間、認識理念與時間的三個層次來進行分析。空間指的是國內對於國際環境的影響，乃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強調的是美中兩國國內政治制度的分歧，到彼此對國際秩序的分歧。前者是民主與威權體制的差異，後者是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國際秩序的

差異；認識理念是說明物質如何影響到觀念，藉由導入心理與決策的內涵以辯證雙方關係的變化。亦即是，得利於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將自身打造為世界製造中心，過程中運用大量國家的資本與權力介入，引發美國的不滿，重新強調美中之間價值的不同，視中國為意識形態上的敵人；而時間則是主張空間與認識理念皆是一個發展中的變項，故處於前後階段會呈截然不同的態勢，美中關係因而出現劇烈的變動。過去美中因蘇聯因素而走向夥伴關係，現在則因利益衝突而成為對手而產生分歧。若將這三個層次，結合戰略、經濟與意識形態三個面向，則可以理解美中關係的演變。

從表一所呈現的結構性來看，美國決定對崛起中的中國採取衝突策略，主要是考量到中國崛起已經成為美國當前與未來的威脅，而非過去的夥伴關係，其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經濟與意識形態存在本質上的歧異之外，蘇聯的瓦解也是重要因素。第一、從空間層面分析，在戰略上華府以印太戰略回應中國帶路倡議的擴張，以及解放軍持續在南海與台海持續施壓，使得灰色地區的衝突繼續擴大；在經濟上前任總統川普濃厚的保護主義政策，對抗中國式重商主義，對產業進行補貼並採取全球擴張策略；在意識形態上，則是美國對內強調民主，對外強調人權，而中國則是在以黨專政之下，對內控制對外輸出北京模式，更引起華盛頓不滿。

第二、從認識理念層次分析，在戰略上彼此軍事體系分立之下，美國要避免權力移轉，而中國要加速軍事力量的擴張，雙方就產生物質與理念衝突的共伴效應（Brian, 2008）。其中，在經濟面向，過去北京服膺於華盛頓共識，現在則是努力建立北京共識。美中經濟結構截然不同，對於自由貿易秩序、金融體系、國內政治與社會，甚至是環境議題，都有迥異的發展目標，產生了經濟衝突的根源。

最終，在意識形態面向上，過去強調經濟為主的全球化分工與自由貿易，但是則是以中國違反人權問題，作為圍堵中國的重要依據。

第三、從時間層次分析，在戰略上過去冷戰時代是戰略伙伴，現在則是大國競爭，在南海與北韓議題上相持不下。在經濟上，過去美國決定將中國納入 WTO 體系，採取合作途徑共同打造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現在則是全面圍堵中國在科技、通訊、自由貿易取得全球的領導地位。而在意識形態上，不僅是自由民主強調價值包容，還有過去可以因為共同敵人而包容彼此的不同，現在則是因為中國運用孔子學院進行價值輸出，而成為相互對抗的態勢。

表一 美國與中國三個層次結合三面向分歧

	空間 (國內－國際)	認識理念 (物質－理念)	時間 (過去－現在)
戰略	印太戰略與帶路 倡議的衝撞	軍事體系分立	戰略夥伴－ 大國競爭
經濟	保護主義－ 重商主義	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	合作－圍堵
意識 形態	政治體制－ 國際秩序	經濟為主－ 人權衝突	價值包容－ 價值輸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新古典現實主義早期被視為是外交政策的理論，但是在 Ripsman, Taliaferro 與 Lobell 三位學者一系列的努力下，此主義努力跨越從外交政策到國際關係理論的鴻溝，從短期危機決策、外交政策行為、個別國家的大戰略調整模式，系統性產出以及最終國際體系結構的演變 (Ripsman et al., 2016)。而本文想要解釋的，也不是美國或中國的對外政策，而是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兩強之間的競爭趨於白

熱化，這就需要國際關係理論，而不是外交政策理論，說明國家必須修改政策以回應國際系統所帶來的威脅或機會。而大國（美國、中國）的戰略選擇，對國際體系與結構有重大的影響，國際秩序有可能很大程度的被改變。以現今的美中關係來看，如果美國不能有效平衡來自於中國的威脅，很可能就會帶來實質形式的衝突，照 Allison（2018）的看法，就是戰爭。

戰爭所帶來的後果，往往就是國際結構與秩序的改變，或由雙極轉成單極或多極，或由單極轉成雙極或是多極，完全取決於戰爭的結果。不過，由於美中雙方都是核武大國，大規模核武戰爭的可能極低，因此國內「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的重要性就會上升，這些變量，像是：國內政治、領導人認知、國家綜合能力、國家結構等因素，以解釋國家行為和外交政策選擇（Ripsman et al., 2016）。由此可知，美中之間的此消彼漲，並不是歐巴馬（Obama）造成的，也不是習近平帶來的，而是跟全球化發展、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經濟與金融政策有較大的關聯，而第一線感受生活困頓的美國人民，不會理解體系與秩序因素所種下的惡果，而只會要求當政的領導人解決問題，而特別能將國內問題外銷的政客，就容易贏得政權，為了實踐競選承諾與連任，又進一步的以鄰為壑的政策鞏固權力。

新古典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同時注重國際與國內因素，常被學界批評類似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Putnam（1988）聞名遐邇的「雙層賽局」（*two level game*）。事實上，兩者有本質上的不同，「雙層賽局」儘管也強調國際與國內因素，但是基本的假設南轅北轍，也就是國際上大國之間的競爭的本質是什麼？當國家追求權力與國家合作發生衝突，孰輕孰重？Putman 研究背景是冷戰時期下，G7 高峰會的各

國如何達成協議，建立在美國還能主導的國際貿易秩序下，同盟國間的貿易談判（Alons, 2010），但是在大國對立的情況，雙層賽局理論並無法清楚地解釋（Foulon, 2015）。運用自由主義解釋美中之間的大國競爭與衝突的問題在於國家在安全與經濟議題之間的重要性抉擇會有盲點。

「雙層賽局」主張由首席談判者主導此類決策，運用在美中國貿易談判就會有很大的侷限性（Odell, 2013）。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戰略，也是反映出美國政府面對國內利益團體、政黨競爭之後的理性考量。據此，在中國威脅論成為主流意識，不論是川普還是拜登主政後展開圍堵中國的政策，一方面可以視為是對內面對國內市民社會、利益團體、政黨競爭壓力下的結果，另一方面也看出短時間內不容易與中國達成妥協。

從新自由主義、雙層賽局來觀察美、中衝突的發展，有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預期。美國貿易政策制定可由國際及國內層次來進行分析，包含國際結構的變化，國內政黨政治的影響，以及利益團體的反應，因為美國貿易政策的制定，很多來自於相關業者的需求（黃敬哲，2018）。這個推論和雙層賽局的看法一致，認為貿易戰的決策，是適時反映了國內的現況與要求。但亦有學者指出，美中貿易戰沒有贏家，因為川普每一次增加對中國的經濟壓力，也同時傷害了美國國內的利益團體（朱雲漢，2019）。

與新自由主義迥然不同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而其對外關係與作為很大程度受到國內政治在國際體系結構轉變時的回應，這包括政治領袖外在威脅的來源是否有共同的認知，以及政府包含國會能否動員資源回應挑戰（Rose, 1998）。美國國會推動許多友台法案與國防授權法，都是基於回應中國威脅，而授予行政部

門更大權限，也加大美中競爭的態勢。因此，將國內「中介變數」納入應對國際秩序重組的變局（Schultz, 2013），對於理解當前美中對抗有深刻的重要性。新古典現實主義清楚主張體系與秩序是處於變動的狀態，不同的時期給予不同的壓力，權力與合作的選擇是基於國家當下的力量評估，強調「國內政治」（domestic politics）與「理念」（idea）所融合發揮的效果（Rathbun, 2008）。亦即是，明確的釐清不同時期國家相對力量的轉變，維護美國核心利益處於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與民主人權價值規範。

據此，國家外交政策的選擇就相當明確，霸權國面對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採取「制衡政策」（balancing），以維持自身的優勢，但是夾在兩強之間的小國，就會有扞從與避險的外交政策選擇（Schweller, 1994）。國內政治就成為國內外壓力的中介角色，當國家各界普遍認知到外部威脅時，會要求動員國內資源以追求安全，除了經濟能力之外，最能有效動員的成功要素，就是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Taliaferro, 2006）。因此，美中貿易衝突最常在媒體上看到川普所展現出的就是美國價值勝過毫無人權的中國，美國優先重於自由主義的維繫。有了此一理論上的基礎認識，本文續以戰略、經濟與意識形態與三個構面，辯證中美的結構性衝突。

參、美中戰略的衝突

冷戰結束世界進入單極的體系，中國經過 10 年的努力，1999 年在世界的貿易量只佔 1.8%，而美國則是 13.4%，排名世界第一，中國毫無能力挑戰美國（WTO, 2000）。到了 2014 年，雖然美國還是唯一超級強國，但中國貿易量已經是 4.3 兆美元，成為世界上第一

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2014）。在上一個世紀，中國國內經濟需要國家在國際事務上「韜光養晦」，乃是鄧小平時代所奉行的國家戰略。直至本世紀之初，中國的經濟潛力已為世人所矚目，接續江澤民的胡錦濤政府順勢採取的「和平崛起」已經無法滿足中國旺盛的製造與消費力量，最終走到習近平的「有所作為」。亦即是，2013年接任國家主席的習政府面對的是中國內部市場已經生產過剩（Cai, 2017），需要政府力量將自身巨大市場運用對外投資政策，透過雙邊協議將自身的市場與帶路國家連結起來（蔡政修，2019）。這正是習近平就任不到一年即提出帶路倡議的背景，也說明當時中國政治經濟戰略的改變，是順應內部需求與增張。

一、空間層次的戰略衝突：印太戰略與帶路倡議的衝撞

帶路倡議不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更是轉換中國對外經濟影響力為政治影響力的政治戰略，需要有中國主導的國際組織相輔相成，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 AIIB）與上海合作組織建立了新的經濟和政治聯繫（Goddard, 2018），不再以美國的「價值與規範」來決定資金的提供，而由中國國家利益決定。然而，實踐中國夢的帶路倡議計畫，必然會衝撞美國的霸權與國家利益。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兩任總統歐巴馬與川普，皆無法有效阻止各個盟國參與帶路倡議計畫與 AIIB。美中兩國力量的轉折，充分的說明了一國經濟力量巨幅增長會帶動國際體系變動，而對國家行為由內而外的造成戰略改變。

以理論的視角檢視發現，隨著空間的發展帶來國際體系的變

動，北京發展中國式國際建制的戰略，其實正是運用國際局勢進行戰略擴張，範圍跨越主要經濟走廊的合作，涵蓋中國、蒙古、俄國、中亞、西亞、與巴基斯坦等國。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造成歐美國家對外投資不足，帶路倡議沿線國家既需要基礎建設藉以轉型為工業國家，又能接受中國的經濟領導與政治要求（Cai, 2017）。不僅如此，AIIB 的創建不僅能吸引許多國家資金，更能成為中國可以主導的國際組織，使其強化自己的隊伍，並輸出中國內部過剩的產能（OECD, 2018）。

面對力量的變化，美國迅速調整戰略以挽頹勢。根據 Drew 以及 Snow 的定義，戰略指的是：「行動計畫用以有組織的努力達成目標」（2016: 14）。那麼，美國的戰略目標為何？以美國核心利益的角度觀察，第一是維持霸權，第二是維護美國領導的民主自由價值。如果帶路倡議成功的建立中國式的國際秩序，順利的將經濟影響力轉換為政治影響力，那麼，在亞洲美中的雙階層領導很可能就變成過去式。也就是說，過去一方面接受美國所提供的安全防禦並維持區域秩序，另一方接受大陸已經是區域經濟領導者的角色（Ikenberry, 2015）。因此，全面圍堵中國力量擴張，就是美國對中的指導戰略。歐巴馬雖然不像川普一樣視中國為美國的威脅，但是其任內提出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本質上與川普的印太戰略相近，意圖都是防範中國軍事對外投射能力，將之限制於太平洋之內（Cai, 2017）。川普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指出，目前最嚴峻的挑戰並非恐怖主義，而是來自國家間的「戰略競爭」（inter-state strategic competition）（The White House, 2017）。同時，美國政府、媒體與智庫，均認為中國是採取修正主義的戰略，並且日益挑戰美國所主

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Acharya, 2014)，或者像是 Glaser (2019) 所說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理論既有缺陷，據此制定的美國外交政策更是大有問題。

印太戰略的倡議順勢浮上檯面，集結亞洲地區最擔心中國崛起的幾個國家：日本、印度與澳洲。日本比美國更早看出帶路倡議的戰略威脅，安倍晉三 (Abe) 早在 2012 年公布與印太概念相近的「亞洲民主安全之鑽」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印度因為中國力量已經投射到南亞地區，不斷重申印度在此區域的角色，加上澳洲日益擔心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擴張，也是在 2012 年「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中，開始探討「印太」戰略觀，這四個戰略與價值利益相近的國家開始討論印太戰略 (Maçães, 2018)，最終帶來川普利用 2017 年 APEC 峰會提出對印太願景，美國政府開始將印太戰略作為外交政策加以執行，內容涵蓋安全、經濟和治理等面向。具體而言，2019 年 11 月 4 日美國國務院公布《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促進共同願景》報告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上述四方之間的部長級會議，並啟動基礎設施交易和援助網絡，就是平衡中國在印太地區力量的作法，聚焦在治理和安全問題部分 (Parameswaran, 2019)。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澳洲與日本仍然擔心成為美中衝突會傷害自身利益，因此對於美中競爭是相當小心謹慎 (Friedman, 2020)。

最後將空間戰略視角轉向歐盟，雖然其與美國的價值與規範相近，但深受後歐債危機經濟成長動能不足所苦的歐洲，積極的想要搭上帶路倡議的列車，更加深美國對中國威脅的憂慮。歐債危機之前，歐盟與中國的關係於 2005 年發展到巔峰時，甚至提出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但美國成功出手干預，主政的小布希總統 (Bush

Junior) 聯手參眾兩院，施壓歐洲盟友不允許尖端武器技術輸出到中國，否則連帶影響美國安全，使得歐中戰略伙伴關係出現裂痕 (Shambaugh, 2005)。但是，川普卻無法有效阻止歐洲盟友使用華為設備 (Calabrese, 2019)，很明顯說明在美中衝突中，戰略上歐盟不願意選擇扈從美國。因此，當歐盟此一天然戰略伙伴都不願與美國站在一起，一方固然因為左右逢源的考量，更多時候，美中當前的大國競爭，跟時間點有更大的關係，下一個小節說明之。

二、認識理念層次的戰略衝突：物質－理念分歧

川普在競選總統即開始在戰略上指責中國導致美國製造業轉移產生大量失業，犯下「史上最嚴重的盜竊」(Swaine, 2016: 1-15)。而在就任之後的白宮幕僚群也納入對中政策強硬的顧問，Peter Navarro 把美國經濟困境矛頭指向中國，即是最著名的代表。不僅如此，國際關係學界也聯名出版：《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開宗明義就是指出中國介入美國政府、社會的各個部門，美國的價值、規範與法律需要被保護 (Diamond and Shell, 2018)。該份報告清楚地看出美中在戰略的衝突。同時，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教授、前美國駐華大使、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研究員、前美國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等人為文投稿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題為「中國不是我們的敵人」(China is not an enemy)，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觀點是中國並不尋求推翻幾十年來一直從中受益的當前國際秩序，而且中國的參與對該秩序體系的維護以及在氣候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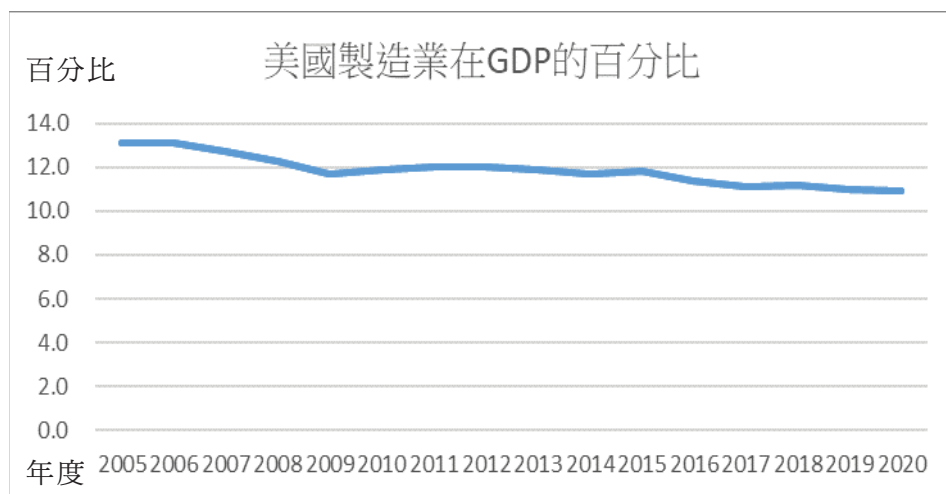
化等共同問題上至關重要 (Fravel et al., 2019)。這兩種立場不同的對中戰略觀，其實反應出民主國家的對外戰略鷹派與鴿派的競爭屬於常態，而且有助於平衡國家與商業界的利益。

進一步而言，美中之間在認識理念層次的戰略衝突，不僅在於雙方軍事體系分立，更是美中雙方物質力量產生了分歧。過去，兩者在全球價值供應鏈中彼此相安無事，美國佔據著最具經濟價值的研發、設計與採購，以及製造後的行銷與服務，而中國僅提供毛利最低的製造部分。然而，在國家力量的挹注之下，中國企業也朝向生產的左右兩端價值端發展，侵蝕到了美國企業的利益，雙方自然產生了物質的分歧。美國控訴中國的國家補貼、違反智慧財產權、強迫技術轉讓等具體行為，並不是川普當選總統才有的行為，而是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奉行策略，美國現在才大力控訴，並訴諸於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將中國描繪成在價值與理念上無法相容的敵人，這即是從物質轉為理念的分歧。

三、時間層次的戰略衝突：戰略夥伴—大國競爭

儘管大國競爭是當前美中戰略衝突的核心概念，但是川普就任總統之前的美中兩國的關係雖稱不上水乳交融，卻也絕不會像現今一般的針鋒相對，為什麼兩任總統之間能夠產生如此大的反差，是個人因素？黨派因素？還是中國對外戰略改變？如果說是兩國經濟力量的此消彼長，但是在 Covid-19 之前，以美國經濟分析局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所提供的數字觀察，經濟指數表現的相當好 (BEA, 2019)，其實並沒有經濟力量下滑的事實。探究其因，乃是全球化下美國經濟結構的改變。從中國加入 WTO 開始之前，美國的製造業早已大量的外移，根據圖二顯示美國製造業佔 GDP 的比例不

斷下滑，逐漸失去製造業產生另一個問題即是，從中國進口的增加將導致製造業的失業率上升（Hoang, 2012）。而將中國視為戰略挑戰者是否就能將製造業重新帶回美國，就成了另一個層次的問題。



圖二 美國製造業在 GDP 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BEA (2019)。

在本文前言所論及的 2020 年白宮《美國對華戰略報告》，反映出的正是霸權衰退的焦慮，是美中之間因時間的延伸，現在對逐步建立中國式國際秩序進行一些反擊，反映出美國在國際組織、國際區域協定以及國際合作的地位已經被中國威脅。中國的強大經濟影響力來不僅來自於 14 億人口龐大國內市場，更是以巨大的製造業力量產生對其他國家貿易的左右。因此川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就是此思維的產物，即是以經濟民族主義，運用保護性關稅重建美國製造業（Porter, 2018）。

時間的變化，說明大國戰略思維的轉變。綜觀柯林頓以降三任

美國總統，大致都能接受「中國和平崛起」。即便是美中衝突頻傳，舉凡美軍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事件、中美撞機事件、2005年美國海軍在南中國與中國海軍衝突等等挑戰，美國始終都沒有對中國採取嚇阻或是圍堵或是敵意的戰略。歐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也並不受到亞洲盟友的歡迎，主因就是憂心美中雙方過度的競爭導致他們必須選邊站，而無法左右逢源（Acharya, 2014）。

但是台灣則似乎受惠於美國的戰略改變，參眾兩院不斷通過各種友台法案，諸如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國防授權法案（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台灣國防評估委員會法案（H.R. 5680: Taiwan Defense Assessment Commission Act of 2018, TDACA）、以及協助台灣鞏固邦交的《台北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TAIPEI Act）等等（BBC 中文網，2019），可以看出美國國會協助台灣維持主權的自主性之外，行政與國會已經形成共同的認知，攜手動員國內力量，各式的國會提案紛紛出籠。而由於中國的貿易力量超越俄羅斯，在國防上也高於俄羅斯的四倍有餘，更幾乎是印度、日本、俄羅斯與南韓的總和（Karlin, 2018）。不僅如此，美國共和黨參議員 Hawley 與眾議員 Gallagher 於 2020 年六月分別提出同一版本的《台灣國防法》（Taiwan Defense Act）（江今葉，2020）。不到一年的時間，也就是 2021 年三月參眾兩院又分別提出《台灣研究獎學金法案》（Taiwan Fellowship Act）草案（江今葉，2021），明顯加強與台灣的戰略夥伴關係。不過，戰略衝突不足以解釋美中全面性的矛盾，下節以經濟面向討論之。

肆、美中的經濟衝突

基於前述本文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運用，因為經濟能力是判斷相對物質權力的重要指標，美中以戰略衝突為核心，價值衝突為正當性，在經濟議題上的衝突，可說是無可避免。經濟議題的衝突是基於川普所倡議的美國優先，以及經濟保護主義。簡短回顧美中貿易戰的發生，大致上以 2017 年 8 月 14 日，川普指示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依照「301 條款」¹（Section 301）對中國是否涉及侵犯美國智慧財產權與強迫技術轉移，展開貿易調查。在 2018 年 3 月，調查結果出爐，確認中國以各種方式竊取美國的智慧財產，川普立刻就在 3 月 22 日簽署制裁令，針對高達五百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尤其以「中國製造 2025」密切相關的商品開徵 25% 以上的關稅，美中貿易戰至此正式開打。

一、空間層次的經濟衝突：保護主義－重商主義

美中貿易戰的爆發，可以視為美國對中國經濟與戰略佈局的正式轉向。川普動用 301 條款，理由是要平衡美中的貿易逆差，以及懲罰中國侵犯美國的智慧財產與技術轉移，這是基於美國國內經濟結構轉型的需求，從自由主義走向保護主義。進一步分析，美中貿易逆差是長時間累積的結果，中國運用重商主義，也就是以國家力

1. 301 條款是美國在 1974 年為平衡進出口貿易的順逆差，透過美國國會立法授權美國總統實施保護措施，以避免國內產業遭受國外競爭壓力影響，也就是貿易法第 301 條。其方法包括對進口產品設定高關稅、限定或減少進口配額等經濟政策。

量侵犯智慧財產與強迫技術轉移，也不是短期的事。

以貿易逆差而言，按美國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20）所提供對中國貿易的官方資料顯示，在 2010 年時，美國對中國進出口貿易逆差為 2730 億美元。但到了 2018 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已經突破四千億美元關卡，已經達到 4195.2 億（參見表二）。這個意思是說，美國過去可以忍受貿易逆差、對中國技術轉移、智慧財產的衝突也可以忍受，直至川普總統上台後，才重新檢討了對中政策。隨著貿易逆差的額度持續增加，加上中國崛起在其他方面帶來潛在的威脅，川普決定不再容忍經貿議題上對中國的讓步。

表二 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額度（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年度總額	上半年度總額
2019	365826 ²	167044
2018	419527	185888
2017	375422	170935
2016	346825	160696
2015	367328	172202
2014	344817	156212
2013	318683	147886
2012	315102	144994
2011	295249	133283
2010	273041	119437

資料來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20)。

2. 2019 年度總額為推估數字，推估方式按 2010-2018 上半年額度佔全年額度的比例後推估。

二、認識理念層次的經濟衝突：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

美國一手建立的華盛頓共識以維護美國利益與世界貿易秩序，中國加入其中並脫胎換骨成為世界工廠，而其挾著巨額的經貿力量，也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北京共識（包淳亮，2011）。這兩種發展模式的衝突，也說明雙方貿易戰是難以避免，美國主要以關稅壁壘作為手段，關鍵與戰略性產業作為標的，表現出以物質力量打擊中國經濟優勢。除此之外，經濟的攻防不僅在美中兩國國內，也慢慢延伸成國際的「匯率戰」（currency war），藉以讓更多理念相近國家共同合作³。2019年8月，美國總統川普再度宣布對中國約三千億美元的進口商品提高10%關稅，不到一週內，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跌破7美元關卡，引發外界對美中新一波貿易衝突提升至貨幣戰的緊張態勢。同月5日，川普在推特（Twitter）指責中國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降至接近歷史低點，是匯率操縱，美國早就應該採取行動（BBC, 2019）。川普一面痛批中國操縱匯率，一面也呼籲美國聯準會盡快降息，在8月19日於推特上公開表示：「至於 Fed 的利率，應該在短期內調降至少100個基點，或許還得推出一些量化寬鬆措施。」這一連串的訊息，透露出匯率戰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息。如果貿易衝突提升到匯率戰，將使美中貿易衝突的影響層次與範圍再次提升。因為美元與人民幣都是國際貨幣，將更直接的牽動國際貿易與市場穩定。

3. 匯率戰亦有媒體翻為貨幣戰。指的是藉由政府對貨幣兌換、匯率政策的操控，打擊或反制敵對國在經貿上敵對行為。

綜觀美中貿易衝突的發展趨勢，從 2018 年 3 月開打迄今，有幾個意涵與具體的趨勢可供討論。首先，美中貿易的不平衡不是這兩年才開始。早在 1990 年代，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就已經開始，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兩國的貿易也日益密切，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數字持續升高，到 2018 年首次突破了四千億美元，這使得川普出手干預有了正當性。其次，在 2018 年發動的貿易戰，是以提高關稅、發動 WTO 制裁為手段。而提升關稅的產業類別，直指戰略性、資訊等國家安全的核心產業為主。針對這些產業提高關稅，一方面降低貿易逆差的成長，一方面也能打擊中國在資訊、通訊、航太等指標性戰略產業上擴張的趨勢。第三，貿易戰持續進行，由於中國對美出口遠大於進口，因此必須透過其他手段反制，在 2019 年 8 月以後，出現以匯率戰反制的趨勢。但是否會全面擴散，以及美國是否也以降息反制，仍需要觀察兩國後續的談判結果。總而言之，美中的貿易衝突是鑲嵌在價值衝突的一環，既是經貿的利益衝突，也反映了價值衝突的本質。因為美中兩國目前是世界上前兩名的貿易大國，因此兩國的貿易戰甚至演變為匯率戰之後，影響的是全球市場的經濟穩定。台灣當然更不可能自免於外。

三、時間層次的經濟衝突：合作－圍堵

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的關係一直是學界爭辯的議題，美國過去對中國在經貿議題上的讓步，是基於對傳統「現代化理論」、「政治發展」理論的期待，然而許多研究都顯現出中國是一個例外，改革與開放甚至延遲了政治的自由化。（吳玉山，1998；Gallagher, 2002；Haggard & Kaufman, 2016）。相較於前任的胡錦濤，習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以後對內控制更嚴格、對外擴張更積極的作法下，中

國所採取的重商主義政策，也讓美國不得不採取保護主義作為回擊。換言之，協助中國經濟成長，所期待的政治轉型不僅落空，反而助長了「中國價值」的輸出，威脅到美國在世界上的佈局與安全。台灣經濟研究院盧俊偉研究員在一篇網路評論指出：「1990年代，伴隨著美國對中的貿易赤字逐步升高，美國亦曾經對中國啟動幾波「特別301」（Special 301）調查，不過最後並未採取強硬立場，而以雙方簽署諒解備忘錄告終，中國也承諾將強化智慧財產權保障。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美國國內對於如何看待中國，仍處於政治爭辯之中，一派觀點認為應採取圍堵策略，迫使中國內部進行改革；另一派則主張與中國進行建設性交往，將中國拉入國際體系之中，使其成為一個遵守國際規範的國家，同時期待其經濟改善之後，能夠依照西方民主國家發展經驗，逐漸演變成為一個民主化國家（盧俊偉，2018）。

就如同《美國對華戰略報告》所承認的美國對中國判斷錯誤，低估北京在思想與政治，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程度。承認錯誤之後，就是要從讓步走向對抗。貿易戰的另一個策略是針對特定的產業或企業禁止進口。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宣布，中國電信設備大廠中興通訊違反與美政府達成的協議，禁止美國企業未來7年向中興通訊出售零件，當天立即生效實施。中興在隔日4月17日，在香港和深圳股市停牌（Lynch, 2018）。2018年5月，美中雙方展開談判，在協議過程中美方要求中方停止對「2025中國製造」計畫的策略性產業提供補貼及其他支持，並將對大陸的貿易逆差至2020年需降低二千億美元（Fensom, 2018）。中方也要求美國對投資給予平等待遇，並警告中國可能會把美國企業排除在經濟開放措施之外。此後，美中貿易戰打打停停，雙方時而看似達成協議、時而重啟衝

突，受到影響的產業、企業甚廣，甚至連帶影響周邊國家的貿易表現。貿易戰可說是美國與中國各項衝突中，影響層面最廣，傷害也最直接的一項衝突。

美中貿易戰的模式，主要是以提高關稅為手段，以減少貿易逆差為目的。但從開徵關稅的商品類型以及後續懲罰的企業類型可以看出，在降低貿易逆差的背後，依舊有圍堵中國崛起的意圖。因為特別鎖定的產業以航太、資訊、「中國製造 2025」等重點項目為主，這些項目不僅具有經濟利益，也具有戰略價值在內。國內學者高長就指出：「川普政府對（中國）大陸實施貿易制裁不斷加碼，究其動機，表面上是雙邊貿易失衡不斷擴大，川普要求（中國）大陸降低美國對（中國）大陸貿易赤字，要求（中國）大陸進一步對美開放市場，而更深層的目的則在於試圖重演 1980 年代美日貿易戰戲碼，壓制（中國）大陸經濟崛起，除去（中國）大陸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高長，2019：90）。由此可知，貿易戰具有多重意涵，一方面在於降低美國對中的貿易逆差，而本質上也是呼應了價值衝突，並且配合戰略衝突，選取具有安全戰略意涵、國安連結較高的產業，作為提高關稅與商業懲罰的標的。

因此，美中雙方之間的經濟衝突就會以限制中國產業在全球擴張為手段，並運用意識形態的不同，呈現出現在的圍堵中國作為是基於防止未來中國價值成為普世價值的理性，故兩國政治制度的分歧，乃至於對國際秩序的內涵也會產生分歧，分析如下。

伍、美中意識形態的衝突

美中衝突進入了意識形態，以空間、認識理念與時間三個層次

分別進行檢視。

一、空間層次的意識形態衝突：政治體制－國際秩序

空間層次指的是由國內到國際上的意識形態衝突。美中戰略衝突的核心在於美國霸權地位的絕對優勢不若以往，然而美中之間的對抗若要取得正當性與合法性，能在國內外受到美國人民與國際盟邦的支持，則必須取得價值的制高點，而最好的切入點，就是民主與共產的根本差異。然而，美中雙方分歧從來就不是因為不同政治體制：美中過去可以超越意識形態的藩籬而建交，今日無法忍受中國的一黨專政，顯得過於昨是今非。因此，美國承認自己過去對中國有著錯誤的假設，以為中國在融入世界經濟體之後，會走向民主政治。再者，美國更以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可能會被中國推翻呼籲盟友團結抗中國。然而，過去美國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締造者，而中國是最大既得利益者，今日卻都想推翻既有秩序，原因只有一個，在國際體系鬆動與變化的過程中，大國都希望新的國際秩序是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打造。

此外，美國決定對崛起中的中國採取衝突策略，主要是考量到中國崛起將伴隨未來的威脅，而非形成夥伴關係。中國崛起之所以會成為未來的威脅，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與中國的「價值體系」（value system）存在本質上的歧異，因此兩強的各種衝突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是價值與物質衝突的共伴效應。其中，兩國意識形態的差異涵蓋面向甚廣，對於世界秩序、經濟體系、國內政治與社會，尤其是人權等議題，都有迥異的發展目標。

在美國本身認知中，冷戰時代的結束，美國成為全世界唯一的

超強，目前的國際體系主要是根據其想法與意願所建構起來的，而國際上其他強權國家中，在美國內部認知裡最有可能成為美國未來的挑戰對手，從上個世紀的蘇聯與日本，到本世紀的中國。美國時時刻刻對潛在競爭者保持警覺心，如何回應來自中國的挑戰就成為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同義詞（趙文志，2006）。是以，對美國而言，中國崛起最大的挑戰，是在於中國的意識形態與西方自由民主在本質上是相互衝突的，這使得美國面對崛起中的中國，採取圍堵的正當性大幅提昇。

以 Mearsheimer (2019) 在《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為文主張中國與俄羅斯已經是強權，世界進入多極體系，又因為美國在各方面還是強大很多，所以這是一個不平衡的多極體系 (unbalanced multipolarity)。在現階段的國際體系結構下，美國其實已經無力維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現行的國際貿易秩序更是不符合美國當前的經濟結構與國家利益而必須修正，這也正是為什麼川普政府要以中國違反 WTO 遊戲規則為藉口，杯葛 WTO 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癱瘓上訴機構 (Brewster, 2019)，甚至不惜犧牲與傳統盟國的經貿關係。美國經濟與貿易結構已經無法維持區域合作或是國際組織的多邊秩序，⁴，不過若是改採單打獨鬥的雙邊主義單邊政策，美國就會有相對優勢，畢竟，美國還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因此，在空間上美中雙方都對於現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狀況不夠符合自身利益，前者認為後者破壞以規範為基礎的秩序 (rule-based

4. 美國無法維持多邊秩序是結果，其無法維持之根本原因在於受到中國崛起的挑戰，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另一方面，美國經濟不再以製造為主，其進出口僅佔 GDP 的 25%，跟多數國家經貿往來下降，導致經濟影響力下滑。可參閱本文第 138 頁。

order)。甫於 2021 年新上任的總統拜登主張美國要捍衛的就是此一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可見雙方意識形態的競爭會持續下去。

二、認識理念層次的意識形態衝突：經濟為主－人權衝突

在前述意識形態的概念下，過去以自由貿易與發展經濟為主的物質關係，就轉變成以人權衝突凸顯中國的理念衝突。中國的人權問題，長期以來就存在。美國與中國在 1979 年建交，受到冷戰結構的影響，美國亟欲拉攏中國以牽制蘇聯，人權議題並未成為美中衝突的焦點。然而，1989 年中國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加上蘇聯瓦解、冷戰結束，美國開始重視中國的人權問題，人權議題也成為美中的價值對衝最嚴重的一項議題⁵。從 90 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總統柯林頓正式提出「民主和平理論」與「民主價值同盟」以後，前述兩者實際成為二十一世紀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對中國政策的基調。1991 年 11 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佈了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第一部《人權白皮書》，此後幾乎每兩年發佈一部《人權白皮書》。1999 年開始，中共針鋒相對發表年度的「美國人權紀錄」，想要凸顯「不干涉他國內政、反對民主人權輸出」的主張，十多年來雙方各說各話，沒有交集。此外，從 1990 年開始，中國開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展開人權對話，對話至今似乎不見成效，甚至有反效果（董立文，2016）。

5. Wan (1997) 指出，1989 年是美國開始對中國人權議題施加壓力的關鍵年份。在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下，美國社會諸多非政府組織、學界、媒體等社會力量，對當時的小布希總統施加壓力，要求美國對中國的人權議題要有更強硬的政策作為。隨後當選的柯林頓總統，對中國的人權問題不再忍讓，自此，美國與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的衝突就延續至今。

從這段美中人權交鋒中可知，在 2016 年前，雙方經濟合作可以克服人權的分歧。

但是伴隨著中國經濟與外交實力的增長，在人權議題上不僅沒有和歐美國家達成妥協，更結合若干未開發或是發展中的國家，在人權議題上替中國發聲，甚至將國際人權的內涵，從平等權改變為發展權，對抗歐美國家在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所施加的壓力⁶。這樣的行為模式，在國際組織的運作上，明顯與歐美國家對抗，所採取的行為模式，就是以經濟援助為誘因，拉攏意識形態上不歸屬歐美國家，而經濟發展程度偏低的第三世界國家。由此可以看出，在人權議題上，中國不僅不會接受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更藉由崛起中的經濟與外交實力，結合其他非西方意識形態的國家，將對抗的層次拉高成國際上兩個陣營的對抗。

事實上，美國與中國在建交之後，美國對中的政策一開始是較為溫和與期待的。劉致賢彙整美國學者 Friedberg 與 Harding 的看法後指出，自尼克森敲開中國大門促成美中關係正常化以降，民主黨與共和黨基本形成一個非形諸文字的默契：透過「交往」（engagement）政策協助大陸經濟發展，最終將促成其國內政治的民主化。雖然該一默契形成初始階段有冷戰時期制衡蘇聯的因素考量，不過即便 1991 年冷戰隨著蘇聯瓦解而結束，同時「天安門事件」讓美國政府基於人權議題的考量暫停對大陸的接觸外，交往政策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一直是美中互動的基調（劉致賢，2018：24）。由此可以看

6. 例如，在 1996 年 4 月，聯合國難民署（UNCHR）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動議中，中國成功拉攏了馬利、賽內加爾、加彭、喀麥隆、埃及、幾內亞、象牙海岸等發展中或低度開發國家，以經濟援助為誘因，在投票中加入了中國主導的陣營，迴避了聯合國對中國在人權議題上的壓力。請參見 Piccone (2018: 2)。

出，美國對中國政策，原先是寄望中國循著現代化理論的模式，由經濟發展帶動政治上的民主轉型，但中國在經濟發展之後，政治非但沒有民主化，威權體系反而更加鞏固。不僅如此，甚至往外輸出「中國價值」，成為西方自由主義的威脅。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美國無須再對中國的人權發展採取懷柔政策，而是轉為在中國威脅的前提下，採取圍堵政策中的其中一環。

美國與中國在意識形態的衝突，是一種價值體系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等各方面的歧異。在冷戰時期，美國對於這樣的歧異採取的是寬容的政策，有其戰略上圍堵蘇聯的需求，也有對中國政治轉型的期待。一旦戰略需求降低，加上中國政治轉型遲遲未能發生，並且在意識形態上持續與民主自由對抗，甚至有往外輸出，籠絡其他國家共同對抗美國的趨勢，中國威脅論從假設成為具體以後，美國出手圍堵中國也成為一個理性的結果。在這樣的結構下，美中兩相衝突的意識形態成為圍堵中國的正當性基礎，具體的表現則是反映打擊中國經濟與科技發展的正當性，也就是當前美中貿易衝突，以及印太戰略對抗帶路倡議具有道德制高點。拜登自 2021 年上任以來雖然延續川普抗中路線，但是最大的差別就是前者結合民主同盟國家共同回應中國系統性的競爭。美歐願意聯手乃肇因於中國透過國家力量擴展軟實力，以及孔子學院對西方傳統民主價值的影響，將於下節接續分析。

三、時間層次的意識形態衝突：價值包容－價值輸出

隨著中國崛起的客觀事實，過去的「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到現在的「中國威脅」（China threat）因時間上的轉變，就成為美國學界、政界辯論的議題。Dennyza Gabiella（2016）就明確指出，

中國威脅論在本質上是中國意識形態不同於西方，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讓中國在區域甚至全球的影響力都大幅提昇，這使得中國威脅論受到重視，美中意識形態的差異與不相容，也成為美中衝突的結構性因素，因為雙方都不可能調整自身意識形態。中國處於崛起之中，和平崛起的論點有其市場，然而崛起後，中國威脅論逐漸成為論戰焦點。中國的意識形態是否能夠相容於西方的意識形態，過去不重要，現在則成為最重要的考量，因為中國透過官方的力量，制度性的向全球推銷與擴散中國價值。由於中國信奉的意識形態在本質上迥異於西方的民主、人權、資本主義等，因此當中國價值伴隨著中國崛起，開始由官方力量進行「價值輸出」，自然對西方文明的經濟體系、民主人權、甚至國防安全等，這些傳統的「價值包容」形成了威脅。這種透過官方力量、制度性的擴張文化、語言等軟實力（soft power）的作為，將中國與歐美的價值衝突具體體現，「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s）就是最典型的代表。蕭新煌等就指出，中國的孔子學院布局戰略回應了北京近年來在外交政策上逐漸強調軟實力的趨勢，強調透過溫和、潛移默化的說服力量來實踐一套具有潛在影響力但又不具強制性的傳播施為，並將其轉換成國家經營對外關係的新政策工具（蕭新煌、楊昊，2014：4）。

中國在 2004 年創建孔子學院，並積極往全球佈建，以展現、推銷中國崛起的「軟實力」，孔子學院也成為中國往外推銷中國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重要機構。有學者指出，中國建立孔子學院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可以藉由孔子學院來順應中國國內的意識形態需求，緩解中國社會矛盾，為中國高校走向世界提供平臺。其次，孔子學院有助於在國際舞臺上樹立一個良好的、積極有為的、愛好和平的中國形象（劉程，2011：95）。然而，孔子學院在一段時間的迅速

發展之後，許多西方國家發現，孔子學院所帶來的中國價值與文化體系，並不相容於西方的主流價值，例如人權、自由主義等。是以，孔子學院在歐美的發展與影響，不同於在亞洲，而且因為價值觀的差異，孔子學院甚至在部分國家對雙邊合作產生負面作用（Yuan et al., 2016: 334），尤其是在美、歐等西方國家。Albro（2015）就認為，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所資助，在他國所推動的項目可能引起更劇烈的社會辯論（例如對於學術自由的支持），而不是建立正面的、積極的國際關係。這樣的衝擊尤其見於美國、歐洲、加拿大、澳洲等，傳統西方自由主義的國家。Ding 與 Saunders 更直接指出，隨著中國往全球擴張文化、語言影響力的同時，與西方文化產生了軟實力的競爭與衝突。透過軟實力的擴張，中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持續上升，但與歐美國家的衝突則是日益尖銳（Ding & Saunders, 2006）。

價值與文化是模糊的概念，需要具體的政策或議題才能討論衝突的內容與方式。所謂的意識形態或文化內涵，包括價值體系、經濟模式、國家與社會關係、甚至公民社會組織的樣態等。中國在崛起成為美國潛在的競爭對手之後，界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國家、社會、民族等多個方面價值體系的綱領。所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指的是 2006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提出的一個概念。中共官方將其概括為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即「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在此價值體系之中，除了馬克思主義承襲傳統社會主義的價值之外，其他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榮辱觀等

三項，界定了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核心價值。在此意識形態下，黨國的利益優先於個人、社會多元的利益，且為不容挑戰的。這樣的意識形態也和歐美傳統的自由主義以及個人主義等強調價值包容，有著極大的差異，並且表現在諸多具體的政策之中。

陸、結論

本文以新古典現實主義以及戰略、價值、經濟三個面向，從空間、認識理念與時間等三個層次，立體的檢視了美中在川普任期內各項衝突發生的原因與意涵。以空間而言，雙方政治制度分歧以及對國際秩序要求的分歧，使得雙方衝突難免。在以認識理念而論，關鍵的因素不在於崛起兩個字，而是在於威脅：其中包含利益與價值。亦即，中國在文化、世界觀、政權運作等許多意識形態的本質上，與美國傳統的自由主義並不相容。因此就時間而言，崛起的中國已經是一個不可逆的事實，隨著時間的進展，中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持續成長，都將縮小與美國的差距。

不僅如此，因為中國在習近平主政之後，調整了過去長時間「韜光養晦」的戰略，變成更積極的「有所作為」，這項轉變使得中國透過經濟實力，開始將文化、價值對外擴張。習近平在 2012 年擔任總書記之後，曾公開對外提出「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將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及國際體系改革。」（田君美，2017）學者解讀習近平的講話，認為習近平將在國際外交事務上扮演更積極角色，進入國際體系內以制度與規範為對象的話語權競爭。此也說明習近平對外關係發展，將走出韜光養晦、順應潮流的道路，轉向了奮發有為，積極進取的作為（王崑義，2017）。

另一方面，川普連任失利與拜登當選總統並未改變美中衝突的格局與態勢，很大程度解釋本文建立的理論解釋性。川普並不是真正的反中，而是認識到中國對美國所產生的威脅。而拜登的對中政策雖然將「對手」改為「競爭者」，但是從他任命的內閣團隊與到國防部成立專案小組（Task Force）以確保美國在軍事面對中國的威脅做好準備，（Osborn, 2021）可得知美中結構性衝突正在一個起點的階段。

換句話說，中國的戰略轉向與美國經濟結構必須調整。導致美中全面衝突的發生，背景是兩國相對物質權力的接近。為了防止強者與弱者的地位互換，美國對中國採取圍堵政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而美國的圍堵政策，也是國內政治互動的結果。因此，無論就原因或結果來說，美中衝突可說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結果。

最終，美、中兩強的衝突發生在多個議題，但本質仍是鑲嵌在一個國家利益衝突之上。戰略、經濟與意識形態的衝突，說明中國崛起在根本上威脅了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利益。從新古典自由主義的途徑來看，這場兩強之間的衝突，不僅不會在短時間內停止，而可能隨著美國的選舉週期而起伏，也有因為將衝突延伸至其他議題而進入一個全面對抗的可能性。不過，美國的戰略終究是取決於自身國內因素，小國只能承受。然而，當川普大張旗鼓的與中國對抗，部分東南亞國家受惠於轉單效應，得到許多投資與製造的機會，則是始料未及的（Teimouri & Raeissadat, 2019）。

參考書目

- Acharya, Amitav. 2014.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 Albro, Robert. 2015. "The Disjunction of Image and Word in US and Chinese Soft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1, 4: 382-399.
-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Allison, Graham. 2018.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rom Historical Accident to Conventional Wisdom." *Foreign Affairs* 97, 4: 124-133.
- Alons, Gerry. 2010. "Against the Grain: French and German Preference Formation on Agricultural Trade During the GATT Uruguay Round." PhD Dissertation of 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 BBC. 2019. "US Officially Labels China a 'Currency Manipulator'." *BBC* 06 August 2019. in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49244702>.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 Brewster, Rachel. 2019.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WTO." *Th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nline* 14 February 2019. in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aef9/c54659f2b915149cf83f7a314abec5d73fef.pdf>.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 BE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19. "US Economy at a Glance Table." in <https://www.bea.gov/news/glance>.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 Cai, Peter. 2017.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alysis. Lowy Institute* 22 March 2017. in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belt-and-road-initiative>. Latest update 16 May 2021.
- Calabrese, John. 2019. "The Huawei Wars and the 5G Revolution in the Gulf." *Middle East Institute*. 30 July 2019. in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huawei-wars-and-5g-revolution-gulf>.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 Campbell, Kurt M. and Jake Sullivan. 2019.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Foreign Affairs* 98, 5: 96-110.
- Contractor, Farok. 2021. "A Decline in US Manufacturing Because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Don't Believe This Fake New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7, 1: 16-23.
- Debs, Alexandre and H. E. Goemans. 2010. "Regime Type, the Fate of Leaders,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4, 3: 430-445.
- Diamond, Larry and Orville Schell. eds. 2018. *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CA: Hoover Institution.
- Ding, Sheng and Robert A. Saunders. 2006. "Talking up China: An Analysis of China's Rising Cultural Power and Global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ast Asia* 23, 2: 3-33.
- Drew, Dennis and Donald Snow. 2006. *Making Twenty-First-Century Strateg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National Security Processes*

and Problems. Alabama, USA: Air University Press.

Fensom, Anthony. 2018. "US-China Trade War Escalates While a Truce was Called, the Fundamental Tensions have not been Addressed — so the 'War' is Back on." *The Diplomat* May 29 2018.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5/us-china-trade-ceasefire-wont-last/>. Latest update 05 March 2021.

Foulon, Michiel. 2015. "Neoclassical Realism: Challengers and Bridging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7: 635-661.

Fravel, Taylor, Stapleton Roy, Michael D. Swaine, Susan A. Thornton, and Ezra Vogel. 2019. "China is Not an Enemy." *The Washington Post* 03 July 2019. i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making-china-a-us-enemy-is-counterproductive/2019/07/02/647d49d0-9bfa-11e9-b27f-ed2942f73d70_story.html. Latest update 13 July 2020.

FRED(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2020. in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VAPGDPMA>. Latest update 15 March 2021.

Friedman, Uri. 2020. "America is Alone in Its Cold War with China." *The Atlantic* 17 February 2020. in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0/02/us-china-allies-competition/606637/>. Latest update 14 March 2021.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Gabiella, Dennyza. 2016. "How Does Neo-liberalism Explain the Likelihood of China's Threat towards United States' Global Hegemony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ASEAN Studies* 4. 1,

20-33.

- Gallagher, Mary. 2002. “‘Reform and Openness’: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Delayed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54, 3: 338–372. in <https://library.fes.de/libalt/journals/swetsfulltext/15305571.pdf>. Latest update 11 April 2021.
- Glaser, Charles L. 2019. “A Flawed Framework: Wh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 is Misguid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 4: 51-87.
- Goddard, Stacie E. 2018. “Embedded Revisionism: 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Challenges to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2, 4: 763-797.
- Greenspan, Alan. 2010. “The Crisis.” in David H. Romer and Justin Wolfers. ed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Spring) 2010*: 201-246.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 Haggard, Stephan & Kaufman, Robert. 2016. *Dictators and Democrats: Masses, Elites, and Regime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ang, Tung. 2012. “The Impacts of U.S. - China Trade on U.S. Manufacturing Unemployment.” *The Park Place Economist* 20. in <https://digitalcommons.iw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367&context=parkplace>. Latest update 14 March 2021.
- Ikenberry, John. 2015.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31, 1: 9-43.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and Robert Ross. eds. 1999. *Engaging China: The*

-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arlin, Mara. 2018. "How to Read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Brookings* 21 January 2018. in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1/21/how-to-read-the-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 Latest update 14 March 2021.
- Kennedy, Paul. 1989.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issinger, Henry. 2011.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Lampton, David. 2018. "U.S.-China Relations: Revisionist History Needs Revision." Prepared for *Carter Center Conference*. 17 October 2018. in <https://www.cartercenter.org/resources/pdfs/peace/china/china-program-2019/lampton.pdf>. Latest update 14 March 2021.
- Lardy, Nicholas. 2001.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Brookings* 25 April 2001. in <https://www.brookings.edu/testimonies/u-s-china-economic-relations-implications-for-u-s-policy/>. Latest update 13 March 2020.
- Lowell, Dittmer. 1981. "The Strategic Triangle: The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33, 4: 485-515.
- Lynch, David. 2018. "U.S. Companies Banned from Selling to China's ZTE Telecom Maker." *The Washington Post*. 16 April 2018. in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business/wp/2018/04/16/u-s-companies-banned-from-selling-to-chinas-zte-telecom-maker/> Latest update 11 April 2021.
- Mações, Bruno. 2018. "Two Belts, Two Roads." *Hudson Institute* 13

- February 2018. in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4158-two-belts-two-roads>. Latest update 14 March 2021.
- Mearsheimer, John J. 2019.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 4: 7-50.
- Medcalf, Rory and Raja Mohan. 2014. “Responding to Indo-Pacific Rivalry: Australia, India And Middle Power Coalitions.” *Analyses* 08 August 2014. in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responding-indo-pacific-rivalry-australia-india-and-middle-power-coalitions>. Latest update 16 May 2021.
- Medeiros, Evan. 2019.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2, 3: 93-119.
- Morgenthau, Hans. 1963.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Odell, John. 2013. “Negotiation and Bargaining.” in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79-40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ECD. 2018.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Landscape.” in OECD. ed. *OECD Business and Finance Outlook*: 61-101. Pairs: OECD.
- Osborn, Kris. 2021. “Biden Just Set up a Task Force to Ensure the Military is Ready for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11 February 2021. in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biden-just-set-task-force-ensure-military-ready-china-178039>.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 Parameswaran, Prashanth. 2019. “Assessing the New US Free and Open

- Indo-Pacific Progress Report.” *The Diplomacy* 05 November 2019. in <https://thediplomat.com/2019/11/assessing-the-new-free-and-open-in-do-pacific-progress-report/>.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 Piccone, Ted. 2018. *China's Long Game on Human Rights at 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thur Goldhammer. tran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rter, Patrick. 2018. “A World Imagined: Nostalgia and Liberal Order.” *Policy Analysis* 843: 1-24.
- Putnam, Robert D.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3: 427-460.
- Rathbun, Brian. 2008.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17: 294–321.
- Reich, Robert. 2015. *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 New York: Knopf.
- Ripsman, Norrin, Jeffrey Taliaferro and Steven E. Lobell. 2016.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1: 144-172.
- Schultz, Kenneth. 2013.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78-502.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Schweller, Randal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 72-107.

Shambaugh, David. 2005. "Lifting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B. Gill and G. Wacker. eds. *China's Rise: 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 23-29. Berlin, Germany: SWP.

Stiglitz, Joseph E. 2011. "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 *Vanity Fair* 31 March 2011. in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Swaine, Michael. 2016. "Chinese Views on the Presumptive 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illary R. Clinton and Donald J. Trump."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50: 1-15.

Taliaferro, Jeffrey W. 2006.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15, 3: 464-495.

Teimouri, Kamran and Seyed Raeissadat. 2019. "Imp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rade War on Growth in ASEA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 Granthaalayah* 7, 3: 64-78.

The White House. 2013.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07 June 2013. in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6/07/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peoples-republic-china->. Latest update 15 March 2021.

The White House.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 The White House.
-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20. *Trade in Goods with China* 09 June 2020. in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2020>.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Report. Washington, D.C.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 Wan, Ming, 1997. "Human Rights and Sino-US Relations: Policies and Changing Realities." *The Pacific Review* 10, 2: 237-255.
-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2014. "China Trade Summary 2014 Data." in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CHN/Year/2014/Summary>.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 WTO. 2000.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in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s2000_e.pdf.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21.
- Yuan, Zhenjie, Junwanguo Guo and Hong Zhu. 2016.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Chinas Global Cultural Network." *China Information* 30, 3: 334 -356.
- BBC 中文網。2019。〈台灣外交是否納入美國保護？美國參院通過「台北法案」〉。《BBC 中文網》2019/10/30。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233841>。2020/01/23。(BBC Chinese. 2019. "Is Taiwan's Diplomacy Includ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Senate Passed the Taipei Act.” *BBC Chinese* 30 October 2019. in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0233841>. Latest update 23 January 2020.)

江今葉。2020。〈繼參議院後美眾議員也推台灣防衛法〉。《中央社》。2020/07/03。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7030027.aspx>。2021/06/11。(Jiang, Jinye. 2020. “Following the Senate,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lso Pushed the Taiwan Defense Law.” *CNA* 03 July 2020. in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07030027.aspx>. Latest update 11 June 2021.)

江今葉。2021。〈美跨黨派議員提台灣獎學金法案送官員赴台強化雙邊關係〉。《中央社》2021/03/11。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3110035.aspx>。2021/06/11 (Jiang, Jinye. 2021. “U.S. Cross-party Congressman Proposes Taiwan Scholarship Bill, Send Officials to Taiwan to Strengthen Bilateral Relations.” *CNA* 03 March 2021. in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103110035.aspx>. Latest update 11 June 2021.)

王崑義。2017。〈中國大陸全球化戰略—理論、力量與倡議〉。《展望與探索》15, 8: 47-71。(Wang, Kun-Yi. 2017. “China’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 Theory, Power, and Initiative.” *Prospect & Exploration* 15, 8: 47-71.)

田君美。2017。〈習近平的國際戰略作為與國際形勢挑戰〉。《經濟前瞻》174: 20-26。(Tian, Jun-Mei. 2017. “Xi Jinping’s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Action and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Economic Outlook* 174: 20-26.)

- 包淳亮。2011。〈半邊陲大國的有限軟實力：以北京共識在拉丁美洲為例〉。《展望與探索》9, 2: 83-102。(Pao, Chwen-Liang. 2011. "The Limited Soft Power of A Semi-Peripheral Country: An Analysis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in Latin America." *Prospect & Exploration* 9, 2: 83-102.)
- 朱雲漢。2019。〈貿易戰揪盟國孤立中國，Trump 其實撐不久〉。《天下雜誌》2019/06/03。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5446。2021/04/23。(Chu, Yun-Han. 2019. "Trade War with Allies Isolating China, Trump Actually Holds Out Soon." *Common Wealth Magazine* 03 June 2019. in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5446. Latest update 23 April 2021.)
- 杜玲玉。2015。〈習近平「中國夢」之探討〉。《展望與探索》13, 3: 40-64。(Tu, Ling-Yu. 2015. "A Study of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Prospect & Exploration* 13, 2: 40-64.)
- 吳玉山。1998。〈現代化理論 vs. 政權穩定論：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政治科學論叢》9: 443-464。(Wu, Yu-Shan. 1998.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the PRC: Modernization Paradigm Revisite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 443-464.)
- 林正義。2009。〈台灣防衛性公投與美國對台政策調整〉。《歐美研究》39, 2: 334-370。(Lin, Cheng-Yi. 2009. "The Taiwan Defensive Referenda and US on Taiwan Policy Adjustments." *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39, 2: 334-370.)
- 林孝庭。2017。《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Lin, Siao-Ting. 2017. *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New Taipei City: Walkers Cultural.)

高長。2019。〈美「中」貿易戰及其對全球經貿衝擊〉。《展望與探索》17, 4: 88-106。(Kao, Charng. 2019.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Its Impact on World Economy.” *Prospect & Exploration* 17, 4: 88-106.)

黃敬哲。2018。〈另一個角度看貿易賽局，淺析美國行動戰略〉。《科技新報》2018/04/14。https://technews.tw/2018/04/14/look-at-the-trading-game-from-another-angle-and-talk-about-the-action-strategy-of-china-and-the-united-states/。2021/05/21。(Huang, Ching-Che. 2018. “An Analysis of Overlooked Strategies of U.S during Trade War.” *Kejixinbao* 14 April 2018. in https://technews.tw/2018/04/14/look-at-the-trading-game-from-another-angle-and-talk-about-the-action-strategy-of-china-and-the-united-states/. Latest update 21 May 2021.)

傅豐誠。2017。〈大陸舉辦「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之意義與影響〉。《展望與探索》15, 6: 8-15。(Fu, Feng-Cheng. 2017. “The Implications and Impact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spect & Exploration* 15, 6:8-15.)

董立文。2016。〈論中、西方的人權對話與交鋒—中共的人權論述策略〉。臺灣民主基金會編《2016 中國人權觀察報告》: 217-240。臺北: 臺灣民主基金會。(Tung, Li-Wen. 2016. “A Confrontation of Human Righ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CCP’s Discourse and Strategy.” in Taiwan Democracy Foundation. ed. *2016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 217-240. Taipei: Taiwan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趙文志。2006。〈中美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以人民幣匯率為例〉。《東吳政治學報》24：69-115。(Chao, Wen-Chih. 2006. "Economic Factor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the Case of 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69-115.)

鄭必堅。2004。〈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 2003 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理論參考》5：3-4。(Cheng, Pi-Chien. 2004. "China's Peaceful Rise of New Roads and the Future of Asia—A Speech at the Boao Forum for Asia in 2003." *Journal Of Theoretical Reference* 5: 3-4.)

劉致賢。2018。〈美「中」貿易衝突背後的國際政治經濟意涵〉。《展望與探索》16，6：22-29。(Liou, Chih-Shian. 2018.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in the Global Economy." *Prospect & Exploration* 16, 6: 22-29.)

劉程。2011。〈孔子學院海外研究現狀、特点及對策〉。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193-207。(Liu, Cheng. 2011.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Overseas Researc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 193-207.)

歐錫富、龔祥生。2019。《2019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台北：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https://indsr.org.tw/Download/2019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pdf](https://indsr.org.tw/Download/2019%20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pdf)。2021/03/17。(Ou, Xi-Fu and Xiang-Sheng Gong. 2019. "2019 CCP Political and Arm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Report."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in <https://indsr.org.tw/Download/2019> 中共政軍發展評估報告.pdf. Latest update 21 March 2021.)

閻紀宇。2019。〈中美將掀起匯率戰？兩國相互報復急遽升高，華府將中國打成「匯率操縱國」！〉。《風傳媒》2019/08/06。
<https://www.storm.mg/article/1562063>。2020/05/19。(Yen, Chi-Yu. 2019.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Trigger a Currency War? The two Countries have Increased Sharply Retaliation, Washington Labeled the Chinese ‘Currency Manipulator’!” *Storm Media Group* 06 August 2019. in <https://www.storm.mg/article/1562063>. Latest update 19 May 2020.)

盧俊偉。2018。〈川習會談然後呢？美中貿易戰將進入「延長賽」〉。
《獨立評論》2018/12/24。<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88/article/7598>。2020/01/04。(Lu, Chun-Wei. 2018. “President Trump's Meetings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and then? US-China Trade War will Enter a ‘Play Off’.” *Dulipinglun* 24 December 2018. in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88/article/7598>. Latest update 04 January 2020.)

蔡政修。2019。〈一帶一路上的美中角力：全球網絡文化的權力觀點〉。
《遠景基金會季刊》20，1：1-60。(Tsai, Cheng-hsiu. 2019. “U.S.-China Competi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Perspective of Power Based on Global Network Culture.” *The Prospect Quarterly* 20, 1: 1-60)

蕭全政。2020。《臺灣政治經濟學：如何面對全球化與中美海陸爭霸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Hsiao, Chuan-Cheng. 2020. *Taiwanese Political Economy: How to Fac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China-US Sea-land Competition for Hegemony?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蕭全政。2004。〈論中共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22：1-29。(Hsiao, Chuan-Cheng. 2004. "On the "Peaceful Ri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29.)

蕭新煌、楊昊。2014。〈孔子學院在中國－東南亞關係政治中的角色〉。《遠景基金會季刊》15，3：1-56。(Hsiao, Hsin-huang Michael and Alan Hao Yang. 2014.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Politics of Guanxi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Prospect Quarterly* 15, 3: 1-56.)

謝志淵。2018。〈美國「印太戰略」的機遇與挑戰－兼論對臺灣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52，3：61-75。(Xie, Zhiyuan. 2018.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Influence on Taiwan." *Navy Professional Journal* 52, 3：61-75.)

The Origin of Contemporary US-China Conflicts — Exploratory Structural Analysis

Tzuli Lin* Yu-chung Shen**

This article structurally examines th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of US-China conflicts from three levels of the spatial, temporal, and cognitive, as well as three dimensions of strategy, value, and economy by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 terms of the spatial,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two side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make conflicts unavoidable. In terms of the temporal, the rise of China is already an irreversible fact. As time progresses, China's continued economic and military growth will narrow the ga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 fusion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ved at the cognitive level and entered the conflict of strategic dimens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key factor is not the word of “rise”, but the threat. Moreover, China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traditional liberalism in the nature of value systems with the US such as culture, world vision, and governmental operation.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at because the three-level confli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mbine the three-facete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 Professor, Department/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conflicts, they become structural conflicts. Therefore, the competi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not end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trade agreement or the end of the Covid -19 epidemic, but will continue to compete until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establishes a new order.

Keywords: US-China conflict, US-China trad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der